

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

第一圈

【上】

[俄] 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 著

景黎明 译 田大畏 审定

他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他曾熬过地下写作的岁月，就像神话中的勇士从海底走出，以其作品见证了二十世纪，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史上不朽作家的行列。

А. Солженицын.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第一圈 上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一圈 (上 下) / [俄] 索尔仁尼琴著; 景黎明译.

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5059-6723-6

I. ①第… II. ①索…②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

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4973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 01-2009-2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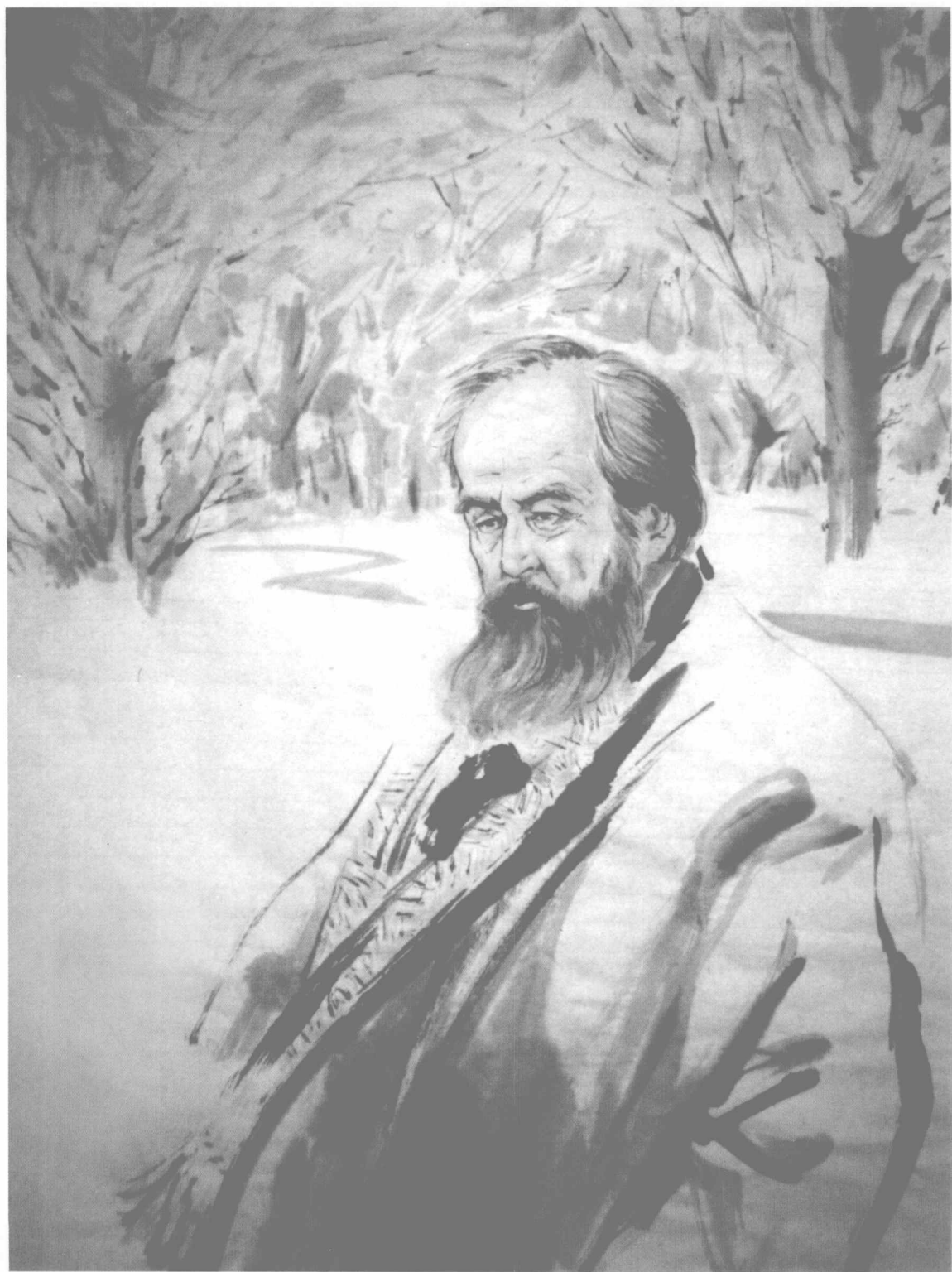
“Pervyl kroug”

© 1968, 1978 Alexandre Soljénitsyne

书 名	第一圈 (上 下)
作 者	[俄] 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
译 者	景黎明
审 定	田大畏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柏松
责任校对	师自运
责任印制	陈 晨
印 刷	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43.75
插 页	5页
版 次	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723-6
定 价	70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高莽 绘

悲怆的俄罗斯良心

——代译序

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因病逝世，终年八十九岁。这个消息刚一传出，世界各大媒体便纷纷加以报道，人们再一次称作家为“俄罗斯良心”。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俄罗斯一个最重要作家的声音，虽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，如此高寿已经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迹，但听到这一消息，仍然不禁怅惘良久。对于那些喜欢他的读者来说，这种发自内心的怅惘还与个人的阅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个由暴力控制的现代社会，让我们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写作。如今，又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离去，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寂寞了。

索尔仁尼琴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，这个传统包括了普希金、果戈理、赫尔岑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名单。1970年，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，便是由于他“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”。索尔仁尼琴于一战结束时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兹洛沃茨克，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，同时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。二战期间他曾赴前线作战，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而被克格勃逮捕，在监狱中度过八年，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。1957年他被恢复名誉，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，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当他的第一部小说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公开发表时，人们就已经意识到，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。有人将他看做是当代的托尔斯泰，但实际上，他的经历和写作都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他们俩都曾遭受过可怕的监禁和流放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，索尔仁尼琴则在监狱里身患癌症，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。所不同的是，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。

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苏联、东欧的地下文学。表明这种现象的是一个源于俄语的词“萨姆伊兹达特”(самиздат)，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油印出版物，这个词现在已成为苏联、东欧所有地下写作的代称。早在1956年，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萨姆伊兹达特写作，索尔仁尼琴就是从流放地读到了囚犯沙拉莫夫的狱中诗集。而他最初的写作也是始于劳改营里，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偷偷写在碎纸片

上,然后一句句背诵下来,再把纸片毁掉,隔一段时间又重背一遍,直到彻底记住为止。后来,在作家再次被禁止公开出版作品,其手稿也被官方没收时,发行他作品数量最多的仍然是国内的萨姆伊兹达特组织。这个情节被作家写进了小说《第一圈》中,一个囚犯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,他试图把描写监狱经历的小说交给来探访的妻子带出去,但慑于严格的检查,又不得不将手稿吞下去。

地下文学的性质表明它是一种为时代作证的文学,抵抗遗忘的文学。这样的写作是自由的,但也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责任。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曾这样说道:

“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,在冰冷的寒夜里,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。不止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,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。”

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,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,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。出于对文学的一种特殊认识,索尔仁尼琴坚信写作能够拯救世界,文学所蕴涵的真实品质可以粉碎一切谎言,他在获奖词中还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:“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”,并让这句朴素的俄罗斯谚语从此传遍了整个世界。从第一部中篇小说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到《癌病房》、《第一圈》、《古拉格群岛》、《红轮》和《牛犊顶橡树》等,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穿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。然而,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,如果那些分散在苏联广袤大地上的各个劳改营,像群岛一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“第二领土”,那么有勇气对抗这种强权和暴力的作家就如同是“另一个政府”。也许这块领土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全部,但却绝对代表了个国家最富于精神性的一部分。索尔仁尼琴由此开创了—种新的文学题材和类型,即批评家们所称的“集中营文学”。但这仍然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接力,囚犯题材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,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;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,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。仿佛苦难就是这个民族的宿命,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。

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以赛亚·伯林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,他从古希腊残诗“狐狸知道很多的事,但刺猬只知道—件大事”中得到启迪,认为所有的大作家都可以分为两类,—类作家是狐狸型的,追逐许多目的,能够体察世界的复杂多态;另—类作家是刺猬型的,专注于—个中心思想,将—切都归于某个唯一、普遍的原则。前者如莎士比亚、莫里哀、歌德、普希金、巴尔扎克、乔伊斯等,后者如但丁、陀

思妥耶夫斯基、尼采、易卜生、普鲁斯特等。索尔仁尼琴显然属于刺猬型的作家。当他被捕后，他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，倾听上帝的声音，此后的岁月里，他一直站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的反抗，在苏联无所畏惧地对抗极权统治，到了美国又毫不留情地抨击物质崇拜，坚信自文艺复兴以来，这个世界便出了问题，只有恢复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艺术观念，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拯救。这使他具有一种对真理的罕见洞察力，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。

这一争议也影响到对他作品的看法。有人认为，他的获奖是由于冷战因素，这种官方看法当年曾导致作家未能前往瑞典领奖，并在几年后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国，流亡他乡。即使许多非官方的读者，也同样唯美地认为，作家的创作政治性太强，艺术性并不高。然而，这种思想与艺术的二分法，从来都不是作家创作时的想法，而是来自教科书的观点。其实，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的时代，这本是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却真的以为，揭露社会黑暗只能是西方作家的责任，而不能发生在苏联阵营的作家身上，否则就是违背了真实的原则。对索尔仁尼琴的不同看法，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某种深刻的分裂状态，那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痛苦处境的无动于衷。什么是艺术性？是体裁、技巧还是虚构？它难道不是包括一部作品新的叙事方法和新的人物形象？难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也是以一种反文学的面目出现？我们肯定它们，仅仅因为现代派作家批判的是西方社会，还是因为西方作家的创作才代表了文学的唯一标准？有意思的是，由于索尔仁尼琴坚持忠实于生活本身，他对那些将世界仅仅视做文本的前卫艺术同样特别反感，认为他们对新奇的迷恋与真正的艺术无关，而是与二十世纪的灾难有关。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，他是一个永远的异端，一个不合时宜的人，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。

有的文学标榜为艺术而艺术，有的文学将其宗旨定义为说出基本的真实，后面这种文学观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。正如索尔仁尼琴在给其挚友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中所指出：“通常，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，但是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。在俄罗斯，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。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一种传统，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。”这种见证的文学观或许只能来自基督教的文化，相信最后审判，相信善终将战胜恶，尽管在这个传统中，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往往过于紧密，过于严肃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虚构和叙事技巧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，因为那些通俗的科幻、侦探、言情与武侠小说也都能做到这点，而且能做得相当不错。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，文学

的最高标尺只能是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。一切伟大的文学其实都是一种见证，是对人性的探讨，不是见证时代，就是见证存在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这价值就在于它的沉甸甸的时代分量。正如《古拉格群岛》卷首题词：“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，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。但愿他们原谅我，没有看到一切，没有想起一切，没有猜到一切。”如今，“古拉格群岛”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词语，成为苏联斯大林时期“非人的残暴统治”的象征。后世的读者要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，了解这个世纪的人性表现，就不能不读他的作品。

《第一圈》的写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六十年代在国外发表。驻外二秘瓦洛金在一个电话亭打电话，提醒一个熟人可能遭到迫害。围绕这个事件，展现了一个特殊监狱的生活。文学的职责就是赋予这个世界以隐喻，索尔仁尼琴喜欢用隐喻题写书名，《古拉格群岛》中的“古拉格”三字是苏联“劳改营管理总局”的俄文缩写，“群岛”则象征着广袤土地上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所组成的群岛。《癌病房》的书名则象征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病象丛生，道德沦丧。在书中，它既是一个真正的医院，又是一个苏联社会的缩影。《第一圈》则出自但丁的诗作《神曲》，诗中将地狱分为九圈，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圈，作家以此比喻小说中描写的一个特殊监狱。在那里，一群科学家囚犯终日从事着各种监控社会的科研项目，通过破解语音，那个二秘最终被秘密逮捕。此外还有《红轮》系列，它包括了《1914年8月》、《1916年10月》、《1917年3月》几大板块，书名取自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车轮的比喻。从这些隐喻的书名也可以看出，作家描写的是一个秘密的世界，人们远离正常的生活，没有自由，没有人权，甚至也没有性爱的权利。这不像是个现代国家，而像是法老的统治。统治者的一切努力，一切社会工程，仿佛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将人民关进笼子里。

在作家看来，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。然而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，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，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，半夜不会有克格勃来敲门。“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，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。”这是一个共同的没有根本区别的命运，所有人的区别只在于是生活在大监狱里还是小监狱里而已。在《第一圈》中，囚犯的妻子们因为丈夫而失业，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，比她们丈夫更像囚犯。正如一位囚犯妻子所说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谈不上真正的勇敢，她们不需要忍受整个社会的歧视和当局的迫害，相反还会受到诗人们的讴歌传颂。索尔

仁尼琴把自己的作品称为“没有主角的小说”，书中总是描写众多的人物形象，应当就含有这样的意思。当然也意味着在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中，囚犯还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，而在二十世纪的“古拉格群岛”，个性已经成了不可想象的奢侈品，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胸前佩带的号码。为此作者在其作品中往往采用一种复调结构，打破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叙事，而以群体的各个经历为主线，从而在书中展示宏大的历史画卷，凸现出一幅受难者的群雕。

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，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阴郁的形象：囚徒的形象。它常常使人想起作家当年摄于劳改营的那张著名照片，目光里永远充满警觉和思考。正如作家借《第一圈》中一位囚犯的话，一旦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，他就超出了权力的控制，获得了自由。索尔仁尼琴的囚徒意识是如此强烈，以致在其集中营题材的虚构作品中，主人公身上往往都能看到作家个人的影子，如《一天》中的舒霍夫，《癌病房》中的奥列格，《第一圈》中的涅尔仁，这些人物身上都具有一种思考的特征，桀骜不驯的特征。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充满仇恨，为了生存不得不施展各种手段，但同时却始终坚守着人的尊严与道德底线，以其朴素的经验和认知揭示着这个真理：一个充斥着强权与谎言的世界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。凡是读过其作品的读者都不得不承认，索尔仁尼琴有着非凡的叙事能力。在他的笔下，劳改营的氛围似乎弥漫了整个国家，令人窒息。如在《古拉格群岛》第三部第五章中，一个女囚犯成功地逃跑了，看守气急败坏地要惩罚全劳改营的人，这时一个姑娘叹了口气说：“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！”于是她被罚站在冰天雪地里几个小时，深秋的夜风煽动着篝火的火焰，她在寒风里啜泣和哀求。作者从远处望着她：

“她是一个淡黄头发的、傻乎乎的没什么文化的小丫头。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。小妹妹，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！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。

“火，火！……当我们打仗的时候，曾凝望着篝火，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……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。

“我向火和你，姑娘，许下诺言：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。”

任谁读了这样有血有肉的文字都会感到震撼，就像听到作家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那样，悲怆、忧郁，而又充满力度。在此书第五部第六章中，同样描写了两个囚犯在中亚草原上逃跑的故事，他们在逃跑途中偷吃农户的饲料，露宿在灌木丛、干草垛里，甚至还划船到了一个小岛上，在那里升起炊烟做饭，但最后

他们仍然被充满警惕的军民抓住，重新回到监狱。作者从旁发表议论说，十九世纪的时候，人们会把食物和衣服送到流放的囚犯手里，可现在人们只会出卖这些囚犯。相比之下，沙皇时代的专制无疑是太温馨了。书中草原的景色与人物的心理融为一体，给人一种天罗地网无处可逃的感觉，其紧张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描写历险的名作，同时又让人在极端的压抑中，感受到一种高扬的人性，它逼使人们不能不思考，这一切的意义何在？

见证的文学表达的是人性对自由的渴求，这样的文学不仅是美学的，而且是伦理的。俄国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。一天早晨，她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看望她的儿子，一位老妇人转身问她：“您是女诗人阿赫马托娃吗？”她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老人又问：“您是否认为有一天您能够讲述这个故事？”女诗人沉默片刻，然后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会试试的。”老人激动地望着她，毫无血色的脸上显出一丝微笑。这就是俄罗斯灵魂，对苦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。虽然苦难本身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，但俄罗斯作家的力量就在于他们能够将苦难转化成一种意义，一种对生存的感悟，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，仿佛寒夜的星光在永恒地闪烁。

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，尤其对那些以消遣为目的的读者来说，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种考验和挑战。他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因为太过于悲怆与沉重，常常使人不忍卒读，而作家的语言也是同样充满悲怆与沉重，句式斩钉截铁，桀骜不驯，如同将一根钢钎狠狠砸进岩石层里。这只浑身长刺的刺猬永远只有一个中心主题，坚称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价值，那就是对于一个作家说出“基本的真实”比什么都重要。经过多年的流亡，当作家重返俄罗斯后，他仍利用自己的巨大声誉，一再告诫俄罗斯人要正面直视历史，深切体会个中苦难。因此，谈论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技巧，也许本身就是很无聊的事。许多人难以接受他归国后发表的那些民族主义观点，但历史上哪一个伟大作家的世界观不是充满矛盾，甚至深刻的偏见？真正重要的是，使俄罗斯文学重新获得世界尊重的不是苏联那些拿着高薪、养尊处优的作协会员，而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，在这些俄罗斯作家看来，不朽的文学应当表现出一个民族怎样存活下来的精神，用文字建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，就像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诗人普希金曾吟咏过的那样：

在这残酷的时代，
我歌颂过自由。
并且还为了那些倒下去的人们，
乞求过怜悯同情。

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。在2007年接受俄罗斯国家荣誉奖的获奖感言中，索尔仁尼琴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文学事业：“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、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、历史题材、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。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，它还将帮助我们，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。在俄罗斯历史上，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，是它们搭救了我们。”所有人都意识到，这篇发言其实是作家在向这个曾历经苦难的世界告别，言辞一如既往地充满悲怆。他一生都是以一个曾经的囚徒身份说话，如果有人对此不能理解，那不是因为作家太固执，而是人们太健忘了。

能够理解司马迁的中国读者，想必能够理解这种以生命的写实和史实的力量作为文学的高标。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是民族的良心，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，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，正如以赛亚·伯林对阿赫马托娃的评语，这样的人甚至“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”。在这点上，俄罗斯人是幸运的，即使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中，他们也拥有像阿赫马托娃、帕斯捷尔纳克、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一群诗人和作家。正是由于他们的写作与见证，俄罗斯的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，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，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。

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再让古拉格群岛的历史重演，不再让那个劳改营里的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哀求道：“原谅我吧，首长公民！放我进营吧，我不敢了！”

景凯旋

2009年12月25日

主要人物表

英诺肯基·阿尔焦米耶维奇·瓦洛金——外交部二级专员，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二女婿。

杜布洛莫夫——医学教授，曾为瓦洛金母亲的家庭医生。

瓦连京·普梁契科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列夫·格里戈里伊奇·鲁宾——犹太人，语文学助理教授、囚犯。

马克斯·理奇特曼——德国人、囚犯。

阿尔弗雷德——维也纳的物理学系的学生、囚犯。

古斯塔夫——“希特勒青年团”成员、囚犯。

莱因霍德·齐梅尔——希特勒的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、囚犯。

西金——玛尔非诺监狱内务部行动特派员、少校。

格列布·维肯季耶维奇·涅尔仁——数学家、囚犯。

维克托·谢苗诺维奇·阿巴库莫夫——国家安全部部长、大将。

日瓦孔——监狱警卫官、中尉。

塞拉菲玛·维塔利耶芙娜(爱称：西莫齐卡)——监狱职工、中尉。

亚当·维尼阿米诺维奇·罗伊特曼——玛尔非诺研究所所长助手、声学研究室室长、少校。

德米特里·亚历山大罗维奇·索洛格金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安东·尼古拉耶维奇·雅科诺夫——玛尔非诺研究所所长、国家安全部特殊技术局首席工程师、上校。

彼得·特罗非莫维奇·维列尼约夫——教授，国家安全部科研顾问(文职官员)。

福马·古里亚诺维奇·奥斯科卢波夫——国家安全部特殊技术局局长、少将。

米辛——玛尔非诺监狱内务部行动特派员、少校。

雅科夫·伊万诺维奇·马穆林——国家内务部特别通讯部前负责人、上校，后入狱被囚犯称为“戴铁面具的人”。

马尔库舍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阿曼泰·布拉托夫——鞑靼人，工程师、囚犯。

安德列·安德列耶维奇·波塔波夫(爱称：安德留沙)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伊利亚·捷连季耶维奇·霍洛布罗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亚历山大·耶夫多基米奇·波贝宁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戴尔辛(小名:万尼亚)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塞利瓦诺夫斯基—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(文职官员)。

格里戈里·鲍里索维奇·阿布拉姆松——工程师、囚犯(再判犯)。

泽梅利亚(绰号)——电子管专家、囚犯。

罗斯季斯拉夫·多罗宁(爱称:卢斯卡)——大学生,玛尔非诺最年轻的囚犯。

克拉拉·彼得罗夫娜·马卡雷金娜——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小女儿,
监狱职工、中尉。

米哈伊尔·德米特里耶维奇·柳明——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。

亚历山大·波斯克利贝舍夫——斯大林的私人秘书、重要的亲信,中将。

斯皮里东·叶戈罗夫——监督勤杂工、囚犯。

康德拉绍夫-伊万诺夫——画家、囚犯。

纳杰拉申——监狱警卫官、少尉。

克利缅季耶夫——玛尔非诺监狱狱长、中校。

娜佳——囚犯格列布·涅尔仁之妻,研究生。

伊拉里昂·巴甫洛维奇·格拉西莫维奇——物理学光学专家、老囚犯。

舒斯特曼——监狱警卫官、中尉。

德沃耶索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弗拉基米尔·耶拉斯托维奇·切尔诺夫——教授、囚犯。

尼古拉·阿尔卡季耶维奇·加拉霍夫——作家,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大女婿。

卡迈香——监狱官、中尉。

拉丽萨·尼古拉耶夫娜·叶米娜——监狱职工。

伊万·伊万诺维奇——囚犯。

鲍里斯·谢尔盖耶维奇·斯杰潘诺夫——玛尔非诺党支部书记。

克拉斯诺古宾基——监狱卫兵。

雕刻师——囚犯。

布利巴纽克——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、将军。

斯莫洛西多夫——玛尔非诺狱官、中尉。

伊万——玻璃工、囚犯。

娜塔丽娅·巴甫洛夫娜·格拉西莫维奇(爱称:娜塔莎)——囚犯格拉西莫维奇之妻。

彼得·阿发纳西耶维奇·马卡雷金——检察官、少将。

狄奈拉——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大女儿、作家尼古拉·加拉霍夫之妻。

多特娜拉(小名:多蒂)——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二女儿、外交专员英诺肯基·瓦洛金之妻。

塔玛拉——监狱职工。

阿廖沙·兰斯基——文学评论家。

奥尔加—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。

穆莎—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。

柳德米拉——莫斯科大学进修生。

艾丽卡—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,匈牙利人。

达莎—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。

夏果夫—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。

伊萨克·卡干——玛尔非诺囚犯(被捕前是一名仓库管理员)、眼线。

阿韦尼尔——英诺肯基的舅舅。

拉伊萨·季莫菲耶夫娜——英诺肯基的舅母。

阿列夫金娜·尼卡诺罗夫娜——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现任妻子。

斯洛伍塔——检察官、少将,马卡雷金检察官在法学高级班读书时的同学。

杜尚·拉多维奇——塞尔维亚人,马卡雷金检察官在内战时期的老战友。

曾卡——克拉拉大学时的同学。

叶尔米洛夫——文学评论家。

克雷卡乔夫——玛尔非诺原党支部书记、中尉。

亚瑟·西罗马哈——囚犯、眼线头目。

维克托·柳比米切夫——囚犯、眼线。

奥罗宾采夫——化学博士、囚犯。

罗马绍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。

肖慕什金——设计师、囚犯。

第一章

架子上，那座青铜时钟生了锈的指针，正指着四点五十五分。

这是深冬季节。

灰蒙蒙的天空和即将消逝的日光，使那座钟看上去显得更加灰暗了。嵌有双层玻璃的高大落地窗，俯视着下面街道上疾驰而过的车辆和正在铲雪的守门人。雪刚落下不久，但已经浸湿了地面，由于来往路人的践踏，甚至已变得污秽不堪了。

外交部二级专员英诺肯基·阿尔焦米耶维奇·瓦洛金凭窗伫立，盲目地凝望着街上的行人，尖声尖气地吹着口哨。他的手指不停地翻着一本光泽夺目的外国杂志，但眼睛却没有停留在杂志上。

专员长得又高又瘦。他的职衔相当于外交系统的中校。但他没有穿制服，而是穿着一件闪光的上衣，看上去像是一个年轻的游手好闲的人，而不像是外交部一名担任要职的官员。

该把办公室的灯打开，或者该回家了。但专员既没有开灯，也不打算回家。

下午五点钟虽不是工作日的结束，但也是不太重要的一个时间段。此刻，事实上人人都准备要回家吃饭、休息，或打一个盹。到十点光景，莫斯科四十五个联盟级部和二十个共和国级部成千上万的窗户，将重新灯火通明。在那壁垒森严的要塞式的墙壁内，有一个人备受失眠之苦，但他却因此训练了莫斯科全体官员，让他们陪同他一道熬更守夜，直到清晨。深知他的习惯，所有的部长像小学生一样静静地坐着，等待他的召唤；为了使他不打瞌睡，部长们便去传唤副部长，副部长们又去折磨科长；那些资料员沿着梯子爬上爬下，寻找着卡片索引；办事员们在走廊上跑来跑去；而速记员则写断了一支又一支的铅笔……

现在，正逢西方圣诞前夜。所有的大使馆已冷清两天了，电话保持着沉默。外交官们很可能已坐在圣诞树前。当然，外交部里照常有夜间工作。值班人员趁机下象棋，讲逗趣的故事，或者索性躺在沙发上睡觉。但工作仍照常进行。

英诺肯基·瓦洛金紧张不安的手指漫无目的地迅速翻着杂志，内心里隐约闪现的恐惧的火花，时而上升成小小的火焰，时而熄灭，使他不寒而栗。

自从孩提时代起，英诺肯基·瓦洛金就认识杜布洛莫夫医生。在杜布洛莫夫成名之前，在他参加代表团出国之前，甚至在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成为人们的话题之前，英诺肯基就认识了杜布洛莫夫——他们是他们的家庭医生。英诺肯基的母亲总是找他看病。母亲经常生病，除了杜布洛莫夫，她谁也不信任。只要杜布洛莫夫在大厅里脱下海狸帽子，整个套房就洋溢着友爱、镇静和信赖的气氛。在母亲的床边，杜布洛莫夫医生总是要呆半个多小时，不厌其烦地认真询问症状，仔细检查病人，详细解释治疗的每一个细节，仿佛他是世界上最不忙的人。每当他离去之时，从英诺肯基身边走过，总是要停下来，向这个小男孩提点什么问题，并严肃地等待着回答，似乎他真的期待着小孩给予既聪明又至关重要的答复似的。那时，医生的头发已经灰白……

扔下手中的杂志，英诺肯基打了一个寒战，心有所思地在房里踱来踱去。

他该不该给医生打一个电话呢？

假若这件事涉及的是另一个人——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某位专家——英诺肯基就绝对不会想到要去警告他。然而，这恰恰是杜布洛莫夫医生……

如果从公共电话间打电话，一打完就立刻离开，会不会被人发现呢？他们难道还能从电话里辨认出那闷塞的声音吗？肯定不能——还没有这样的专门技术。

他走向书桌。在灰暗的房间里，他只能辨认出最新工作指令的最上面一页：他即将被派遣到国外，星期三或者星期四，总之，在新年之前，他就要乘飞机离去。

最明智的办法是等待；是呀，等待才是最明智的。

天哪！一股寒战扫过他的肩头——那不习惯承担千斤重担的肩头！如果他根本没有听说那事，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该有多好啊！

他把桌上所有的文件收在一堆，放进保险柜里。

认真想一想，杜布洛莫夫应允要做的那事，怎么会有人反对呢？正如一切有天赋的人那样，他是慷慨无私的；一个天才者的知识，作为人类共有的财富，总是随时准备与他人共享的。

英诺肯基内心的不安愈来愈强烈。他把头靠在保险柜上，闭上眼睛稍适休息。

突然，好像机会的最后片刻就要消失了似的，他没有打电话叫汽车，甚至没有盖上墨水瓶盖，就冲了出去，锁上门，把钥匙交给走廊尽头的值日官。他穿着便

装,跑下楼梯,从那些穿着绣金和金绶制服的本机关职员们身旁疾步而过,冲进了那阴冷的黄昏。

外交部半围的院坝里,耸立着瓦·瓦·沃罗夫斯基^①的纪念碑。从纪念碑前走过,卢比扬卡^②广场上那座新楼跃入眼帘。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!此刻,这座大楼对他似乎别有含义:那灰暗外壳的九层高楼,分明是一艘战舰;那战舰右舷的十八个壁柱,分明就是十八座炮塔!英诺肯基感到了孤独和虚弱。他不由自主地穿过小广场,被大楼吸引了过去,就像乘着一艘小艇追随着飞速前进的庞大战舰一样。

接着,他转身逃走,径自朝着铁匠桥街方向走去。在广场外的市场附近有一辆出租汽车正准备开走。英诺肯基钻进出租汽车,命令司机急驶过铁匠桥街,然后左转,朝着彼特罗夫卡开去。

此时,路灯刚刚点亮。

他始终犹豫不决,寻思着在哪里打电话可以不受干扰,至少没有人用硬币敲打公用电话亭的玻璃。可是,要着意寻找一个安静、偏僻的电话间,这一行动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;也许还是在这里挑选为上策,这里有熙来攘往的人群,但一定要选一个隔音的,电话应安装在墙里面的。突然,他又想到,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,让司机成了见证人,这有多么轻率啊!他立即在口袋里搜寻十五戈比硬币。然而,他又很快镇静下来,感悟到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,事情已无选择余地,无论是危险还是安全,都得即刻打电话。

如果畏首畏尾,还能算一个人吗?

车驶到猎市大街交通信号灯处,他在口袋里摸到的不是一个硬币,而是两个十五戈比的硬币——这是吉兆。

过了莫斯科大学朝右转,出租汽车加速开上了阿尔巴特街。英诺肯基给了司机两张纸币,没有要司机找零钱,就下了车,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,不慌不忙地穿过广场。

这时已是华灯齐放。电影院门前,人们已排队买票,等待着《芭蕾女演员的爱情》影片的放映。地铁站上方用红色霓虹灯所显示的“地铁”二字,被笼罩在灰蒙

^① 瓦·瓦·沃罗夫斯基:1871—1923,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家,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之一。十月革命后担任外交使节,1923年遭暗杀。

^② 卢比扬卡:莫斯科市一个广场的名称,一度改名为捷尔仁斯基广场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、内务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国家安全委员会(克格勃)先后设立于该广场上的原俄国保险公司大楼内。